

徐庆全 著

周扬与冯雪峰

冯雪峰的特殊使命：党与鲁迅的联系人

『两个口号』大争论

『四条汉子』与鲁迅的关系

冯雪峰的灭顶之灾

江青在三十年代问题上大作文章

『一条汉子整三条汉子』 周扬被推上祭坛



湖北人民出版社
HUBEI PEOPLE'S PRESS



徐庆全 著

周扬与冯雪峰



湖北人民出版社
HUBEI PEOPLE'S PRESS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扬与冯雪峰/徐庆全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

ISBN 7-216-04166-6

I.周…

II.徐…

III.①周扬一生平事迹②冯雪峰(1903 ~ 1976)——生平事迹

IV.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2302 号

周扬与冯雪峰

徐庆全 著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 毫米×1015 毫米 1/16
字数:269 千字
版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数:1-11 000
书号:ISBN 7-216-04166-6/K · 424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9.625
插页:1
印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周 扬



冯雪峰



序言

周
魏
峙

周扬自二十多岁就步入左翼革命阵营，担任“左联”党团书记，1937年从上海来到延安，作为文化艺术界的领导人，周扬一直为毛泽东所倚重。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周扬一直是中国意识形态的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并被称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执行者。

周扬的是非功过，需从历史的氛围来看。在党内政治生活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周扬在思想上的睿智和理论上的卓识是他人难以企及的。但是，当党内政治生活不健康、指导方针存在着严重失误的时候，周扬也难置身事外，他不但竭力宣传执行“左”的理论，而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严重伤文、伤人。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周扬对于过去“左”的思潮造成的危害心情甚为沉重，他从理论的高度对自己在十七年中的工作进行了深切的反思，尤其对在“左”的路线指导下伤文、伤人的事情有了醒悟，感到十分沉痛。

子曰：“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韩愈说：“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人能知自己的过处，是大智，坚决改之，是大勇。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扬的确做到了大彻大悟，大智大勇。“文化大革命”以后，在那一个全民族反思的年月里，周扬同志真诚地动情地向那些受过伤害的同志致歉，同时泪眼模糊的剖析自己。在谈到30年代文艺问题时，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他们对鲁迅先生的意见尊重



不够的缺点，作为一位文艺界长期的领导人、理论权威，他良知的反思具有深刻性与彻底性。

从历史的反思中向受伤害的同志表达愧疚之意，周扬首先想到的就是冯雪峰同志。

冯雪峰同志比周扬同志长五岁，他与周扬一样，都是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大屠杀的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在周扬因白色恐怖失掉党的关系时，是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和夏衍恢复了他的党籍。在左翼革命文艺阵营中，周冯两人曾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是相濡以沫的同志。

遗憾的是，这种关系并没有多长时间，两人就几乎从战友、同志成为冤家对头。这起因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没有去找周扬、夏衍等党员，而去找了鲁迅，以及“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尤其以后在鲁迅答徐懋庸信中指出“四条汉子（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的问题，使他们的处境十分尴尬。

建国以后，冯雪峰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周、冯二人虽同属文艺界，但当年“两个口号”争论的阴影，一直在他们之间游荡，不但情感隔膜，甚至思想也常处于对立状态。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时，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旧事重提，“两个口号”的论争又成为冯雪峰被划为右派的“罪证”之一；再往后，“文化大革命”揭幕，“国防文学”又被野心家江青诬为资产阶级口号，周扬首当其冲地被揪斗直至入狱；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冯雪峰，也未能幸免，受到残酷的迫害。直至一九七五年冯雪峰生病在家，周扬从监狱释放出来，他去看了雪峰。两位命运多舛的同志站到了一起，相逢一笑泯恩仇，多年的芥蒂终于冰消雪融。

在这次历史的会面之后，冯雪峰写了他生命中的绝笔：《两只锦鸡》。文章中两人胸怀宽阔、对历史有深刻认识的形象，也跃然纸上。



因在文艺界工作多年。周扬、冯雪峰之间的这种戏剧性关系，我也有所了解。也许正因为如此，徐庆全同志才将这部《周扬与冯雪峰》书稿送给我，希望我能读完全稿，提提意见，特别表达了希望我为之写序的愿望。

《周扬与冯雪峰》全书25万字，比较准确地描写了两个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彼此的牵绊、纠葛、恩怨，以及他们在历史风云的变幻中跌宕起伏的命运。读完这部书稿后，虽然对我很有些启发，也让我颇有感慨，但要提笔写序却让我十分犹豫，难以落笔：

首先，虽然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我作为一个进步的文艺青年，在上海左翼文艺界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音乐活动，与音乐界领导比较熟悉，但与周扬、冯雪峰、夏衍等人并未见过面。“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当时，我虽然在报纸上看到，但认识不深。对于周扬与冯雪峰之间的关系，根本不了解。

其次，建国后，我直接在周扬领导的文艺部门工作，但与冯雪峰在工作上的来往不多，只是听说二人之间关系不很融洽，我也不很关心。及至1954年因《红楼梦》研究批判冯雪峰、1955年批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1957年将冯雪峰定为文艺界大右派等几次“左”的批判运动中，扯到历史旧账，扯到“两个口号”论争，我都感到十分意外，我因对于这种伤人、伤文的批判斗争运动有一种天然的反感，总感到在运动中一些有才华的人被打倒很可惜，对工作、创作是很大的损失。加之我业务工作很忙，只参加了必须要求参加的一两次会，对整个批判过程基本上不关心，因而对于“两个口号”论争中的一些情况，仍旧停留在30年代的印象中。因此要我作序感到不够格，难以应允。

不过，我还是愿意为这本书说点自己的看法。这两个政治方向一致的文艺口号竟在文艺界争论了几十年最后被江青利用成为在文艺界打倒一切的突破口，这一段历史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一段“公案”值得我们搞清楚，应该加以分析总结从中取得经验教训。

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时，我不是核心人物，只是参与者之一。



最初在报纸上读到关于“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我认为，这一口号对于抗日救亡、建立广泛的文艺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亡斗争和文艺创作活动是有积极作用的。在周扬文章发表两个月后，有同志要我为进步刊物《生活知识》写文章，我就写下了《国防音乐必须大众化》的文章。我的看法是，“国防文学、国防戏剧”等“文化运动”，具有“一致主张唤起民众，建立民族文化的国防，巩固意识上的阵线，作抗敌除奸收回失地的准备”的作用，因而在音乐方面“实有建设国防音乐”的必要，并进而发出“把‘国防音乐’迅速建立起来”的号召。我还提出，建立国防音乐，必须使音乐大众化，“竭力写得非常通俗，使农工商学兵、老幼男女都能懂得。只有大众能明了歌词的意义，才能形成大众一致的救亡意识”。

因为持有“国防的”、同时也是“大众的”看法，所以，后来读到冯雪峰倡议经鲁迅首肯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后，我也是拥护的。我认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都是抗日的，都是对的，因而对于“两个口号”大争论很不以为然。及至后来这又成为冯雪峰被定为“右派”的罪状之一，我更是不理解。特别在1966年，我读到江青和林彪共谋所炮制的《文艺座谈会纪要》，江青污蔑党领导的左翼文艺是“文艺黑线”的说法，让我不寒而栗——30年代进行左翼运动的人，都是提着脑袋在为革命工作，怎么都成为破坏革命的“黑线”人物了呢？后来我也成为这条“黑线”的头目被残酷批判，但从心底来说，我始终认为左翼文艺是革命的，这样的批判是颠倒历史的，因而对许多现象产生疑问，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一场恶梦”的开始。

“文革”浩劫后，“两个口号”更闹得沸沸扬扬，是非颠倒。以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来看，我认识到：周扬和冯雪峰这两只锦鸡的关系十分复杂，不只是个人的恩恩怨怨。放在革命文艺运动历史的长河中在政治斗争中来考察，这样的悲剧不是他们哪一个人造成的，更多的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历史氛围，这是历史造成的悲剧。他们二人关



系的每一次变化，同我们党对文艺运动领导上的失误和挫折，同建国后政治运动频繁的风风雨雨都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

看到这一层后，我很希望有人能以他们两人的关系作为切入点，从更深层次上考察文艺运动的历史。因为我觉得只有从历史的高度出发，才能很好地总结这场争论。为此，八十年代初，冯文彬同志任主任的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成立时，作为委员的我便向冯文彬同志提出，趁着参加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老同志还健在，应当尽快搜集资料，并组织人员研究总结这一段历史。当时，我虽然兼任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但我觉得力量不足，对这一段的文艺史实进行分析总结，还是应该由党的有关领导部门来进行比较合适。但是，因为这个委员会事务繁多，或其他原因，这个建议也就没有实现。

为了弄清楚一些问题，我也看过周扬和上海文化界一些党员领导同志在延安时谈到他们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后，如何坚持党的斗争，开展革命文艺工作的情况，也看过周扬写的自传、回忆录等文章，并在参与筹办一些30年代文艺先驱，像田汉、阳翰笙、夏衍等人的学术纪念活动时，也多次讲过这一观点，目的是寄希望于一些文学史研究家，希望他们完成这一研究。但是，坦率地说，尽管关于30年代文艺的研究取得了很多值得注意的成果，但以周扬和冯雪峰的关系为切入点的研究成果，我很少看到。现在读到徐庆全同志这本书后，留存在心中多年的愿望又被激活了。

作者徐庆全同志，从一九九六年开始，致力于对周扬和文艺界的研究。也许正因为他不是研究文学史的科班出身，他对周扬和冯雪峰关系的研究，反而是视野开阔高屋建瓴的。不仅仅局限在文艺范畴内研究，而是把文艺活动放在历史的大舞台上进行考察。书中对周、冯二人关系的考察，也是基于这个大舞台。舞台上远景，是我们党一幕幕波澜壮阔、丰富曲折的历史影像；而近景则是文艺运动历史上的一朵朵浪花。远近背景的相互交替，在舞台上活动的周扬和冯雪峰的形象，也就鲜活起来了，两人五十年交往中的一切，也就被还原到一个个历史场景中



去；进而，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建国后几次“左”的大批判运动的历史，也在这种考察中清晰起来。

比方说，三十年代周扬与鲁迅之间不融洽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作者没有人云亦云地单纯纠缠在个人恩怨上，而是从30年代整个上海大的历史环境以及党的组织原则上来提出自己的看法。在作者看来，考察周扬与鲁迅的关系，30年代上海白色恐怖是最主要的线索。正是因为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的日渐加剧，对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严重破坏，特别是1935年对田汉、阳翰笙等文化界党员的大逮捕，导致周扬等人行动更不自由，没有与鲁迅及时沟通的条件，才加深了鲁迅对周扬的一些误解；而远在陕北的党中央更难以得知上海党的组织的具体情况才指示冯雪峰先与鲁迅等非党人士联系，这也是十分正确的、合理的，周扬本不应为此耿耿于怀。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周扬居无定所，行动隐蔽。鲁迅虽然名气很大，为了躲避迫害，也曾多次搬家，周扬和鲁迅难于及时沟通，沟通不到位，误解也就产生了。作为30年代过来的人，作者的这一分析，在我心中引起共鸣。

因此，我很看重作者从历史大场景来定位整个左翼文艺运动史这一特点。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常听到周扬提到的一句话是：“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而阶级斗争是最大的政治。这句话意味着文艺界的每一次运动，都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思潮。因此，研究文学史如果不与政治历史，也就是党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要想取得很好的成果是很难的。徐庆全同志在涉足文学史研究之前，就具备了丰富的党史知识，这就使他对文学史的研究，对周扬和冯雪峰关系的研究，也有了更多的历史感。

这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以史实说话。书中的资料非常丰富，有许多是首次亮相。徐庆全同志是从历史研究转而进行文学史研究的，历史研究所要求的深入挖掘材料、实证史料等素养，他是具备了的。通读全书可以看出，作者在搜求材料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书中那些鲜为人知的材料有两个方面来源：一是留存在文艺界人士个人手上的书札和机关档



案，这些都是未曾披露的，也只有有心人才能搜集到的；一是文艺界人士的口述回忆。听他说，自一九九六年转到对周扬和文艺界的研究后，他主要从事的就是这两项工作。他先后采访了几十位文艺界人士(我也是在他来采访时认识他的)。抱着“历史的书写从来就不是伟人的专利”的想法，作者采访的对象十分广泛，既有亲历重大历史事件的“重量级人物”，也有当年参与历史事件的普通人员，甚至只是高校的一名普通教师。广泛的采访，同一事件不同背景下不同参与者的叙说，便于作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汇总历史全貌，进而得出自己的看法。而这样的采访工作又促进了作者对文艺界档案材料的挖掘和搜集工作。且不说书中的观点如何，就史料而言，此书的出版也是相当有价值的。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具备史学研究工作者的品格，古人称之为“史德”。这也是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按照古人的说法，“史德”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秉笔直书，“誉人不益其美，毁人不益其恶”；二是对于此前不甚清楚的、或者已经有定论的历史事件，经过自己的探索，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作者具有学术探讨的勇气和理智，尽力追求历史学家应有的历史感悟力和洞察力。他虽然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却不是单纯地铺陈史料，而是从史料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力求做到全方位地描述历史。应该说，这种探索难能可贵。

当然，我也不是对书中的观点或分析都赞同，而且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种研究也是没有止境的，学术研究也同样有“与时俱进”的问题。况且，一本书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解决，同时也肯定有某些不足。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这本书的总体评价和认同，也不妨碍我向读者推荐这本书。

是为序。

周巍峙

2004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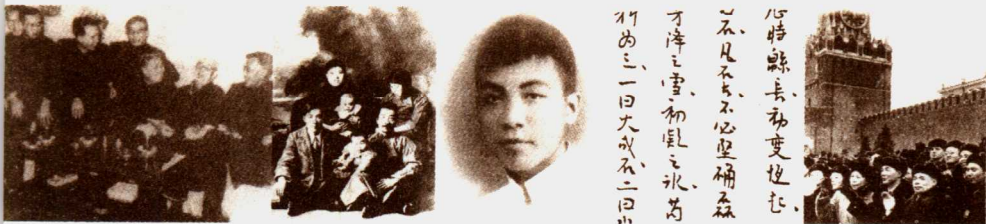


序 言	周魏峙（中国文联主席）001
第一章 从相识到交恶	001
001 两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006 冯雪峰的特殊使命：党与鲁迅的联系人	
010 由相识到争执	
第二章 “四条汉子”与鲁迅的关系	030
032 “四条汉子”与鲁迅的冲突	
040 从历史的视角看待“四条汉子”与鲁迅的矛盾	
051 冯雪峰为毛泽东与鲁迅相知搭桥	
第三章 上海和瓦窑堡：殊途同归	055
057 大变动前夜的周扬	
062 上海和瓦窑堡殊途同归	
065 打出“国防文学”的旗帜	
第四章 “两个口号”大论争	070
070 冯雪峰重返上海	
084 “两个口号”大论争	
097 重新审视“国防文学”的口号	
105 延安对这场争论的看法	
110 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第五章 从对峙到冲突	116
117 工作中的对峙	
119 思想上的激烈冲突	
125 冯雪峰遭公开批判	
139 “战线南移”殃及冯雪峰	
第六章 冯雪峰的灭顶之灾	143





143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145	逃不过的劫难	
168	“大辩论”中的“定论”	
173	改写文学史	
179	不同的地位，相同的历史心态	
第七章	历史的再一次颠倒	184
185	“一条汉子整三条汉子”	
188	江青在三十年代问题上大作文章	
192	《纪要》“文艺黑线专政”论提法的出笼	
195	周扬被推上祭坛	
199	冯雪峰不落井下石	
第八章	两只锦鸡	204
204	度尽劫波后的握手	
211	周扬继续成为被清算的对象	
215	周扬就三十年代问题给中央上书	
第九章	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结论	219
220	带着枷锁的舞蹈	
225	周扬倡导正确评价三十年代文艺的历史	
232	为“国防文学”正名	
243	冯雪峰交代材料和茅盾文章的发表	
248	“西鲁”李何林表态	
263	夏衍说“不能忘却的事”，鲁研界再起波澜	
268	楼适夷、吴奚如为冯雪峰、胡风争曲直	
284	周扬：从历史的高度看待历史	
289	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结论	
后 记		298





第一章

从相识到交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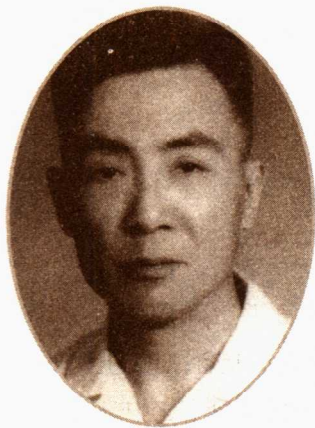
青年周扬（1946年）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上，1927年4月12日，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人的屠杀，使上海、北京乃至全国，都处在腥风血雨之中，以致这个应该有美好记忆的春天，竟成为历史书籍中一个令人一看就能闻到血腥味道的名词——“四一二大屠杀”。

屠杀，使一些共产党人倒下了，但也使更多人加入到有可能再次遭到屠杀的行列。在上海，19岁的大学生周起应，在北京，24岁的已颇有名气的湖畔诗人冯雪峰，几乎是不约而同地站到了镰刀斧头旗下。

■ 两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08年11月，周扬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原名运宜，字起应。在家乡度过了几年近于私塾的学习生活后，1925年秋季，他考入上海南方大学，1926年又转入大夏大学。在大学时期，周扬虽对革命思想非常感兴趣，但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尼采。周扬自述说：



中年冯雪峰

惟因当时在李石岭教授影响下，深深醉心于尼采主义，尼采思想在我的生活中曾起重大作用，我应该说，是革命的作用，他教了我大胆否定一切因袭、传统、权威，在我脑筋中行了一次大扫荡，没有这次大扫荡，接受马克思主义也许不会有这么纯净、干脆。然而也正因为这点尼采主义的教养，使我在一九二七年对革命极端的倾向当中，保持了在组织上超然的立场。^①

尼采的“上帝死了！”“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名言，使周扬受到了鼓舞。在扫荡了“脑筋”中的“传统、权威”的同时，周扬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了对共产党的向往。周扬在自述中写道：

“四一二”以后，正当白色恐怖非常高涨，昨天还是革命者的我所认识的好些同乡，今天突然变成了规矩人的时候，我却再也不能抑制我的愤怒，我感到一种要报复的欲望，于是我就加入了党。

虽然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但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周扬并没有对党所领导的革命有多大作为。加上随之而来的暑假，周扬决定借探亲的机会，到当时大革命的中心武汉去寻找一份工作。在武汉徜徉了一个多月后无果而返。等到他再回到上海的时候，不但他的入党介绍人夏钟润到日本去了，而且“以前的同志许多都不见了”，而“留下的也是消极的消极，自首的自首”，周扬伤心地写道。总之，他“已再找不到组织这个东西”了。

^① 《周扬自传》。这是周扬在延安鲁艺工作期间所写，没有具体日期，据行文推测，大致在1943年前后。



怀着“不能忍受这样长的日子”的心情，周扬不想再在大夏大学熬两年拿文凭，而是转到了不到一年就可以拿到文凭的高师科。在拿到文凭后的1929年初，他来到了左翼思想和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十分盛行的日本，一方面寻找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另一方面将自己的理想融入到左翼文学行列。

就在周扬因为失去组织不堪“忍受这样长的日子”的时候，冯雪峰正在上海，投入到一场与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己任的太阳社、创造社批判鲁迅为主要内容的相对立的“论战”中。

1903年6月，冯雪峰出生于浙江义乌南乡一个名叫神坛的山村。9岁那年，他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设在金华的浙江第七师范学校。1919年的“五四运动”波及金华，发生了反对学校当局专横压制的学潮。冯雪峰作为这次学潮的带头人，被开除学籍。他转而来到杭州，准备继续自己的求学生涯。

1921年秋，冯雪峰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时，这所学校名师云集，后来写成中国文学史主要章节的叶圣陶、朱自清、陈望道等名家，都在这所学校里任教。这样的文学氛围，激发出了冯雪峰文学上的才能，也培养了他文学理论上的素养。在西子湖畔，他与同学柔石、潘漠华、魏金枝、汪静之徜徉其间，人杰地灵的山水，青春期躁动的情感，激发了这些人的灵感。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个章节的“湖畔诗社”，就在那时成立了。作为这个诗社重要一员的冯雪峰，在1921年18岁时，就出版了两本诗集。洋溢在字里行间的那清新的风格，浓郁的情感，感动了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甚至毛泽东等人，他们为此留下了一连串的赞语。

1925年，冯雪峰在北京大学旁听学习。此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很需要得力的干部，他读了冯雪峰的新诗非常喜欢，于是写信给在北京的雪峰，希望他能到南方去工作。冯雪峰虽然离开了令他陶醉的西子“湖畔”，但他文学的情



结则更加浓烈。结果，他拒绝了毛泽东的邀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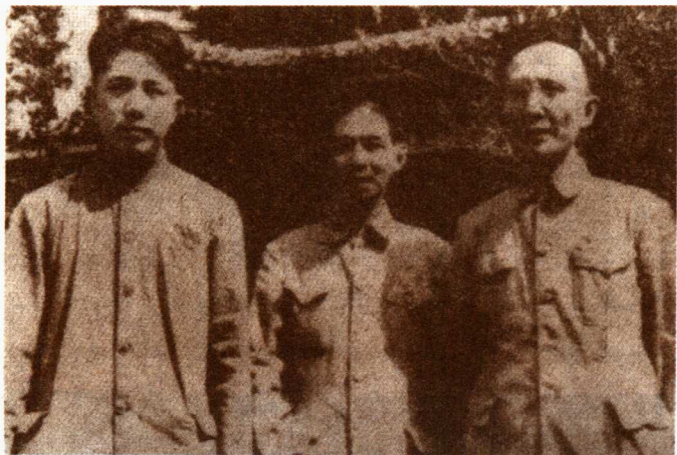
在此期间，冯雪峰以完全自修的方式，学会了日语。那时，日本学者大量翻译外文书刊，其中就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学会了日文的冯雪峰，从1926年开始，阅读和翻译日文书刊，特别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如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著述的马克思文艺理论书籍及介绍苏俄文学的书籍，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惨遭杀害。6月，冯雪峰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1月，他遭到北京当局的通缉。1928年二三月间，冯雪峰离开北京来到上海。

此时，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与鲁迅的“论战”正酣。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革命实际工作。1927年该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同时增加了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从国外回来的新成员。1928年，创造社和另一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太阳社对鲁迅的批评和鲁迅对他们的反驳，形成了这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在争论中，太阳社、创造社把鲁迅、茅盾等一些新文学作家当作革命文学发展的障碍加以批评，宣布阿Q时代过去了，鲁迅思想已过时。

论争初期，冯雪峰就十分关注。作为一名鲁迅的崇拜者，他对一些



周扬（左一）与郭沫若（右一）、茅盾在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中的合影。